

回不去的乡愁

春节,似乎成了时下国人最大的乡愁。有故乡者,归故乡。哪怕山高水长,千难万阻,也要回去;没有故乡者,去他乡,但心中的那缕乡愁,剪不断,即便在天涯海角,也魂牵梦绕。平时,大家“生活在别处”,为生计,为事业,不得不离开各自的“原乡”,到城市,到他乡打拼。心中的那份乡愁日积月累地发酵,在春节时喷薄而出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中国的春节会跟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联系在一起。

近日,一位上海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在网上风行。这是一篇21世纪版的《故乡》。文科博士在故乡遭遇的一切,相比鲁迅当年的遭际,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鲁迅的《故乡》背后,我们能感受到知识者的骄傲,作者是以启蒙者眼光审视故乡的。但从这篇“返乡笔记”中,我们却能感受到知识者彻骨的无助感和无力感。故乡变化太快,变得太入世,太物质,以至于存放不下游子的乡愁。

越是在现实中缺少的东西,越是在心里渴求。为了生计,为了发展,大家背井离乡,扎堆在城市中打拼,拼的是什么?是物质或者可以折算成物质的东西。但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却不是“硬”东西可以弥补的,最柔软的那块东西就是我们文化和精神需要。在很多时候,这种文化和精神之需被置换为“乡愁”,存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乡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,狭义的乡愁是小我的,与个人的血亲传统和成长记忆有关;而广义的乡愁则是文化的。改革开放30多年,加重了国人的文化乡愁。表面上说,我们念兹在兹的乡愁有具体所指,

即狭义的乡愁;其实,在很多时候,狭义乡愁的背后隐伏着深广的文化乡愁。国人最大的乡愁不是寄存在故乡,而是在我们的文化上。只有失去文化根脉的人才会深切感受到“乡愁”的苦味的。

从这位文科博士的“返乡笔记”中不难发现,如今农村变化最大的不是外在环境和物质条件,而是农村的社会关系和人心观念,即维系农村社会的“软组织”出现了系统性崩盘。在作者眼里,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已消失殆尽了。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,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密切的关系和交往。这些温暖、美好的东西,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消失了,转而出现在“游子”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功利的故乡。这一残酷现实显然是游子们不能接受的。但改革的农村也是开放的农村,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农村不可能处变不惊,功利的城市不能要求农村守住清纯。换句话说,有什么样的城市,就有什么样的农村。在城市包围农村的今天,准确地说,在城市文化包围农村文化的今天,农村还能寄存多少城市人的乡愁?在城市出现文化空心化的大趋势面前,农村文化即便有,也会越来越稀薄。

要让农村留得住乡愁,仅靠几个盆景显然不够,需要从大的文化战略和发展战略高度去考虑。如果不从“大我”层面解决文化乡愁问题,仅从“小我”层面将“故乡”定格在时间记忆里,一是不现实,二是显得狭隘自私。客观地说,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日子显然是不现实的,他们也不愿意。故乡的物非人非,不是造化弄



人,而是人们的意志产物。这里我想强调的是:不是说狭义的乡愁不重要,而是说,广义的文化乡愁更重要。狭义的乡愁只有扎根于广袤的文化乡愁根脉上,才能更牢靠。

(转自《南方都市报》,作者张涛甫,有删节)

何谓“大吉”

从甲申年起,每到农历春节,永厚先生(注:黄永厚,著名画家)总作一图贺岁。我则因图为文,说一些与图或相干或不怎么相干的事情。到今年(乙未),十二生肖正好转了一圈。黄先生说:“说点好话吧!”于是题道:“羊年大吉。”

其实,“大吉”是每年都有人在说的。譬如马年,总要说些马到成功呀,一马当先呀;虎年就说些虎虎生风呀,如虎添翼呀什么的。这也不奇,谁喜欢一到年初,便咒霉运当头呢?但若论实际,每年又总是

吉凶交至。就说刚刚过去的马年,大快人心事虽指不胜屈,但国际国内令人伤怀者也并不少,马航失联、亚航坠机,临到岁末,上海还发生了一场踩踏惨剧。对于新的一年,我只希望能失误少一点,成绩多一点;损失小一点,收获大一点;虚骄减一点,实话增一点。积六十多年之经验,深知大鸣大放、大跃进、大批判、大兴大办、大干快上、大运动、“大革命”,虽一时烈烈轰轰,最终都不曾带来预期的福祉,却种下了说大话、说昏话、弄虚作假、瞒上压下等

好学生都去哪儿了

今天的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面向未知世界的想象。他们大多生活在一个被安排的世界里,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世界里,大多也就失去了对最为切己相关的“命运”(即问题)的好奇感。“问题”是一个人的命运,也会是一个国家的国运。对“问题”的不竭探索造成薪火相传的精神,而失去面向“问题”存在的勇气就是所谓的暮气,它表现在只关心直接的、眼前的利益。满眼所及,均皆如此。从小学到高中,学生的暮气深重表现在唯成绩至上;在大学里,学生的暮气表现在唯“钱途无限”为其职业追求。好学生都去哪儿了,实则是理想的激情都去哪儿了。

本文所谓的好学生并非指高考出色

的“考生”,而是指大学里面以探索问题为志向的学生。如果只是学生丧失了理想的激情,如果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的激情的校园里面,还有可能实现“肖申克的救赎”。可怕的是大学也在失去“唯学问”为是非的理想的热情。当大学为各种评审制度钳制的时候,大学的激情就已经被削弱;当各种规章制度变成教师们搔断白发都不得其解的难题时,大学的激情在教师身上也就被削弱;当学生仅为绩点学习时,大学作为象牙塔就已经轰然倒塌。面向学问的激情是大学精神的根源;大学之谓象牙塔,即在于此。

“好”大学必是愚拙的,这样的大学必有不动心的淡定。也唯有这样的大学,

才能造成教师的不动心和一群不动心的学生;一群不以机巧为学问的教师,才能养成一群不以取巧为悦感的学生。这样的不动心,才能真正养成精神传统。精神传统乃是保守的东西,一个开放社会恰恰需要至为保守的精神,就是对于道义、自由、公正、友善和慷慨等等德性的看护和坚守,就是对于宏大理念的信任,也是对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理想的坚持。好学生都去哪儿了?当大学念念于就业率,念念于校友富豪榜及捐赠数额时,肖申克监狱中“安迪”的理想的激情就不再有丝毫的光芒。

(转自《南方周末》,作者章雪富,有删节)

大清“裸官”庆亲王的作风问题

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,名声也不太好,官运却好得出奇。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,他先后负责外事、海军、财政等重要部门,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,当然忙得要命。

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,忙啥呢?吃饭、打牌、投资。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,主题多是庆贺生日。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、孩子一堆,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,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。

然后就是打麻将。为了讨老佛爷喜欢,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官中,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,从官女到太监,无不乐此不疲。

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,慈禧需要舒解心情,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。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。

有人实在看不下去,郑重提出批评意见。慈禧耐心地做人思想工作:

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?但是看来看去,还是他贴心。”

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,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。

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,要想理财,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。对此,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“细大不捐”,大钱不怕多,小钱不嫌少。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,明码标价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买卖好得很。

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,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。这样的事情多了,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:庆氏公司总经理!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,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.5万英镑。

庆亲王格外青睐外资银行,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,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。要是迟生一百年,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、见首不见尾的“裸官”!

二

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。当时北京的餐饮业、娱乐业十分发达。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,

觥筹交错,灯红酒绿。洗牌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澡堂子、戏园子,茶楼、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,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。

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,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,照样每天忙于饭局、牌局,进出外资银行。

“榜样”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梁士诒、那桐、曹汝霖等大人物,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。对此,连老外都忍不住了,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:庆亲王的所作所为,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。

辛亥枪响6年后,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。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,给他加的谥号是“密”,意思是“查找不足,认真整改”!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,还是对于清皇室,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,显然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,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,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,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。

(转自中纪委监察部网站,作者习骅,有删节)

主持人一声“开席”过后,挂在酒店大堂四个角落的音响,顿时传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。回穗返工前,我兴致盎然地参加了一个亲戚的婚礼,坐席中依然是熟悉的、满面红光的笑脸,但场景和仪式却令人陌生——过去在家门口泥地里支起桌椅,如今则是铺满红地毯的敞亮酒店;过去开席前会真刀实枪地燃放一万响鞭炮,如今只是通过音响播放录制好的鞭炮声“意思”一番……

在酒店嘈杂的人声中,我清楚地“听”到了家乡婚嫁活动上传统礼仪的式微,一如春节的年味,农村的乡野文化,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

这些年每至春节,年味变淡都是热门话题,“返乡日志”里充斥着对传统习俗、乡野文化凋敝的忧心,“回家见闻”细细咀嚼着物质主义和消费文

多点参与,

让春节文化慢点式微

化对小城市、村镇的冲击,“春节小忆”不无悲感地感慨“故乡不再是我的故乡,我从此只是她的过客”。加上剩男剩女的婚恋嫁娶之忧,外头打拼游子混得好坏之忧,在春节回家这件事上,温暖惬意似乎越来越雨打风吹去。

客观而言,对于“一年难得几次回”的外头打拼者而言,故乡变陌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,尤其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背景下,返乡者很容易在眼见、耳闻等感官上一时难以适应。不过,相比城市或乡野在容貌上的变化,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嬗变更令人慨叹:高度商业化令市场上的物品一应俱全,饺子有速冻的,糍粑有包装好的,对联各种字体任挑,全家人一起做年货、写对联的越来越少,参与感越来越少;信息化侵袭到各个角落,合家吃团年饭、守岁时,都少不了低头族“搞破坏”,生怕错过红包的年轻人无视长辈们失落的眼神,任意在网络世界里驰骋,不同年辈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困难;功利化大大挤压了亲戚朋友见面聊天的话题,动不动问工资收入、开口就逼婚催嫁,也让本可十分温情的互动走向寡淡。

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,也是文化传承的象征,其标志更应显现在墨迹未干的春联,暗夜中升空的璀璨烟花,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响,全家人边说笑边做出的年货等。充盈其间的,是一年难得一聚的人之亲情,与这片故土长相厮守的家之温暖,宗族邻里的乡野文化精神。我们在受益物质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,应警惕消费至上与物质主义,不管物质如何膨胀,载体如何变更,氛围如何轮转,微信也好,红包也罢,都不能让春节的温情让位。套用尼尔波兹曼《消逝的童年》中的名言,如果没有参与,春节文化这样的东西自然也会大打折扣了。

扫尘、办年货、守岁,多一点现实中的参与,就是多一点年味,多一点春节文化!正月十五还未到,而此刻你仍来得及做的,是给亲朋师友拜一个年,道一声祝福!

(转自《广州日报》,作者唐金凤)